

血病倘若紹興人肯帶了乾菜之類去探險，恐怕可以走得更遠一點罷。

晚，得喬峯信并叢蕪所譯的布寧的短篇輕微的歎歎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裏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爲相宜；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佈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清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纔畢，寄給小峯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勞。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着，彷彿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卻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回來，又躺下，又彷彿在享福。一個行人唱着戲文走過去，餘音裊裊，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聞鈔裏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求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于古小說的判決卻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只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着小說，甚至于還靠着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岳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着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綹長鬚的白面書生，或者還穿着繡金的緞甲，脊梁上還插着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製的關於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卻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

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臺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卻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于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介紹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為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喫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為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

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讐。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于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卻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沈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牀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讜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煙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馬上日記之二

七月七日

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閒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會到日本，卻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胡塗，終于莫名其妙而去；後來病倒在意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迹。但當他精光的腳還未踏着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 (Blasco Ibañez)，中國倒也早有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于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為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 (Skitaletz)，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卻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為着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裏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卻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 (Ivan and Maria) 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裏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裏著了玻璃粉，何況體式更奇于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還有，在中國，姓名僅僅一見于蘇俄的文藝論戰裏的里培進司基 (T. Libedinsky)，日本卻也有他的小說譯出了，名曰「一週間」。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我們的武人以他們的武人爲祖師，我們的文人卻毫不學他們文人的榜樣，這就可預卜中國將來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爲「蘋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麼，他還是不免于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歷了革命了，知道這裏面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着的的人的心。詩人勃洛克 (Alexander Blok) 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

得託羅茲基 (Trotsky) 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于如此森嚴。

可惜我還沒有看過他們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週間。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着，開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為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為沒有革命。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裏，有些無聊。四壁只掛着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

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只得將寶藏着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



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喫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喫得很澈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喫，又須出去買來。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喫得不多，既然喫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喫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但密斯們卻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喫去一點，于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于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只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卻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着，使牠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聲，而且這時纔記起她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喫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裏有黑點的，我們那里稱爲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喫，北京卻用在大酒席上。捲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繫着繩，倒掛在水果鋪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闊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喫煮白菜，則即使不至于稱爲『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喫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別省人喫的，一面想，一面喫，不料這樣就喫完了。

凡物總是以希爲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忒萊爾(A. J. 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亞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兒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時曾在何處和法蘭斯點

頭，他還拍着自己的肩頭說道：你將來要有些像我的。至于四書五經之類，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談爲是。雖然夾些『流言』在內，也未必便于『學理和事實』有妨。



記『發薪』

下午，在中央公園裏和C君做點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報，說，部裏今天發給薪水了，計三成；但必須本人親身去領，而且須在三天以內。

否則？

否則怎樣，他卻沒有說。但這是『洞若觀火』的，否則，就不給。

只要有銀錢在手裏經過，即使並非檀越的布施，人是也總愛逞逞威風的，要不然，他們也許要覺到自己的無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當舖卻用這樣的勢利臉和高櫃臺；明明用銀元去換銅元，錢攤卻帖着『收買現洋』的紙條，隱然以『買主』自命。錢票當然應該可以到負責的地方去換現錢，而有時卻規定了極短的時間，還要領籤，排班，等候，

受氣；軍警督壓着，手裏還有國粹的皮鞭。

不聽話麼？不但不得錢，而且要打了！

我曾經說過，中華民國的官，都是平民出身，並非特別種族。雖然高尙的文人學士或新聞記者們將他們看作異類，以爲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從我這幾年的經驗看來，卻委實不很特別，一切脾氣，卻與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經手銀錢的時候，也還是照例有一點藉此威風一下的嗜好。

『親領』問題的歷史，是起源頗古的，中華民國十一年，就因此引起過方玄綽的牢騷，我便將這寫了一篇端午節。但歷史雖說如同螺旋，卻究竟並非印板，所以今之與昔，也還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張『親領』的是『索薪會』——嗚呼，這些專門名詞，恕我不暇一一解釋了，而且紙張也可惜。——的驍將，晝夜奔走，向國務院呼號，向財政部坐討，一旦到手，對於沒有一同去索的人的無功受祿，心有不甘，用此給喫一點小苦頭的。其意若曰，這錢是我們討來的，就同我們的一樣；你要，必得到這里來領布施。你看施衣施粥，有施主親自送到受惠者的家裏去的麼？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現在是無論怎麼『索』，早已一文也不給了，如果偶然『發薪』，那是意外的上頭的嘉惠，和什麼『索』絲毫無關。不過臨時發布『親領』命令的施主，卻還有，只是已非善于索薪的驍將，而是天天『畫到』，未曾另謀生活的『不貳之臣』了。所以，先前的『親領』是對於沒有同去索薪的人們的罰，現在的『親領』是對於不能空着肚子，天天到部的人們的罰。

但這不過是一個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臨其境，實在有些說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湯，耳聞口講的，總不如親自呷一口的明白。近來有幾個心懷叵測的名人，間接忠告我，說我去年作文，專和幾個人鬧意見，不再論及文學藝術，天下國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來倒是明白了，身歷其境的小事，尚且參不透，說不清，更何況那些高尙偉大，不甚了然的事業？我現在只能說說較爲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謂『公理』之類，就讓公理專家去消遣罷。

總之，我以爲現在的『親領』主張家，已頗不如先前了，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謂『每況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騷如方玄綽者，似乎也已經很寥寥了。

「去」我一得警報，便走出公園，跳上車，逕奔衙門去。

一進門，巡警就給我一個立正舉手的敬禮，可見做官要做得較大，雖然闊別多日，他們也還是認識的。到裏面，不見什麼人，因為辦公時間已經改在上午，大概都已親領了回家了。覓得一位聽差，問明了「親領」的規則，是先到會計科去取得條子，然後拿了這條子，到花廳裏去領錢。

就到會計科，一個部員看了一看我的臉，便翻出條子來。我知道他是老部員，熟識同人，負着「驗明正身」的重大責任的；接過條子之後，我便特別多點了兩個頭，以表示告別和感謝之至意。

其次是花廳了，先經過一個邊門，只見上帖紙條道：「丙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滿百元。」我看自己的條子上，寫的是九十九元，心裏想，這真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同時便直撞進去。看見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說道這「不滿百元」是指全俸而言，我的並不在這裏，是在裏間。

就到裏間，那裏有兩張大桌子，桌旁坐着幾個人，一個熟識的老同事就招呼我了；拿

出條子去，簽了名，換得錢票，總算一帆風順。這組的旁邊還坐着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監督者，因為他敢于解開了官紗——也許是紡綢，我不大認識這些東西——小衫，露着胖得擁成摺疊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過了摺疊往下流。

這時我無端有些感慨，心裏想，大家現在都說『災官』『災官』，殊不知『心廣體胖』的還不在少呢。便是兩三年前教員正嚷索薪的時候，學校的教員豫備室裏也還有人因為喫得太飽了，咳的一聲，胃中的氣體從嘴裏反叛出來。

走出外間，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還在，便拉住他發牢騷。

『你們怎麼又鬧這些玩藝兒了？』我說。

『這是他的意思……』他和氣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麼辦呢？放在門板上擡來麼？』

『他說：這些都另法辦理……』

我是一聽便了然的，只是在『門——衙門之門——外漢』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點注解。這所謂『他』者，是指總長或次長而言。此時雖然似乎所指頗蒙朧，但再掘

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實，但如果再掘上去，也許又要更蒙朧。總而言之，薪水既經到手，這些事便應該『適可而止，毋貪心也』的，否則，怕難免有些危機。即如我的說了這些話，其實就已經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廳，卻又遇見幾個舊同事，閒談了一回。知道還有『戊組』的，發給已經死了的人的薪水的，這一組大概無須『親領』。又知道這一回提出『親領』律者，不但『他』也有『他們』在內。所謂『他們』者，粗粗一聽，很像『索薪會』的頭領們，但其實也不然，因為衙門裏早就沒有什麼『索薪會』，所以這一回當然是別一批新人物了。

我們這回『親領』的薪水，是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份的。因此，事前就有了兩種學說。一，即作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發給。然而還有新來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於是第二種新學說自然起來：不管先前，只作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發給。不過這學說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這個辦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經營過。去年章士釗將我免職之後，自以為在地位上

已經給了一個打擊，連有些文人學士們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人，看過『滿牀滿桌滿地』的德文書的，即刻又悟到我單是拋了官，還不至于一敗塗地，因為我還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於是他們的司長劉百昭便在部務會議席上提出，要不發欠薪，何月領來，便作為何月的薪水。這辦法如果實行，我的受打擊是頗大的，因為就受着經濟的迫壓。然而終於也沒有通過。那致命傷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劉百昭們又不肯自稱革命黨，主張不管什麼，都從新來一回。

所以現在每一領到政費，所發的也還是先前的錢；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間卻在，實在也有些難于說是現今不在，連那時的曾經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學說起來，總得採納一點，這採納一點，也就是調和一些。因此，我們這回的收條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錢的數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這麼一來，既然並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點錢，可謂比較的周到。于我是無益也無損，只要還在北京，拿得出『正身』來。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

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裏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覺得已是一個精神上的財主；只可惜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劉百昭就來動搖過。將來遇見善于理財的人，怕還要設立一個『欠薪整理會』裏面坐着幾個人，外面掛着一塊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們都到那里去接洽。幾天或幾月之後，人不見了，接着連招牌也不見了；于是精神上的財主就變了物質上的窮人了。

但現在卻還的確收了九十九元，對於生活又較爲放心，趁閒空來發一點議論再說。

（七月二十一日。）

記談話

魯迅先生快到廈門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或者因天氣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總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這實在是我們認爲很使人留戀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毀校週年紀念，魯迅先生到會，曾有一番演說，我恐怕這是他此次在京最後的一回公開講演，因此把牠記下來，表示我一點微弱的紀念的意思。人們一提到魯迅先生，或者不免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過于冷靜，過于默視的樣子，而其實他是無時不充滿着熱烈的希望，發揮着豐富的感情。在這一次談話裏，尤其可以顯明地看出他的主張；那麼，我把他這一次的談話記下，作爲他出京的紀念，也許不是完全沒有重大的意義罷。我自己，爲免得老實人費心起見，應

該聲明一下：那天的會，我是以一個小小的辦事員的資格參加的。

〔培 良〕

我昨天晚上在校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遲了，到現在還沒有很醒；正在校的時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腦子裏很混亂，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混亂，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麼多的話可說。

提到我翻譯工人綏惠略夫的歷史，倒有點有趣。十二年前，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事，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裏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那些書是什麼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忒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

爲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里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于『克來阿派忒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裏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這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本，因爲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着的德文書裏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裏文學書多得很，爲什麼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喫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將牠重印一下……。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人。現在一提到俄國，似乎就使人心驚膽戰。但是，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爾志跋綏夫並非共產黨，他的作品現在在蘇俄也並不

受人歡迎。聽說他已經瞎了眼睛，很在喫苦，那當然更不會送我一個盧布……總而言之：和蘇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說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們的文人學士一般。有一個教員因為不受上司的辱罵而被革職了，她背地裏責備他，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巴，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着。究竟後來他們知道我冤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我們的文人學士措辭決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還要華瞻得多。

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他，他于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讎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至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面被破壞，一面修繕着，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的生活了。這個學校，也就是受了楊蔭榆、章士釗們的破壞之後，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過下去的。

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也許說，這是『高傲』得可惡了，該得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盡然。我的家裏還住着一個鄉下人，因為戰事，她的家沒有了，只好逃進城裏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榆，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牠，甚至于連破壞者也誇耀牠。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麼會裏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爲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纔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纔明白了：他原是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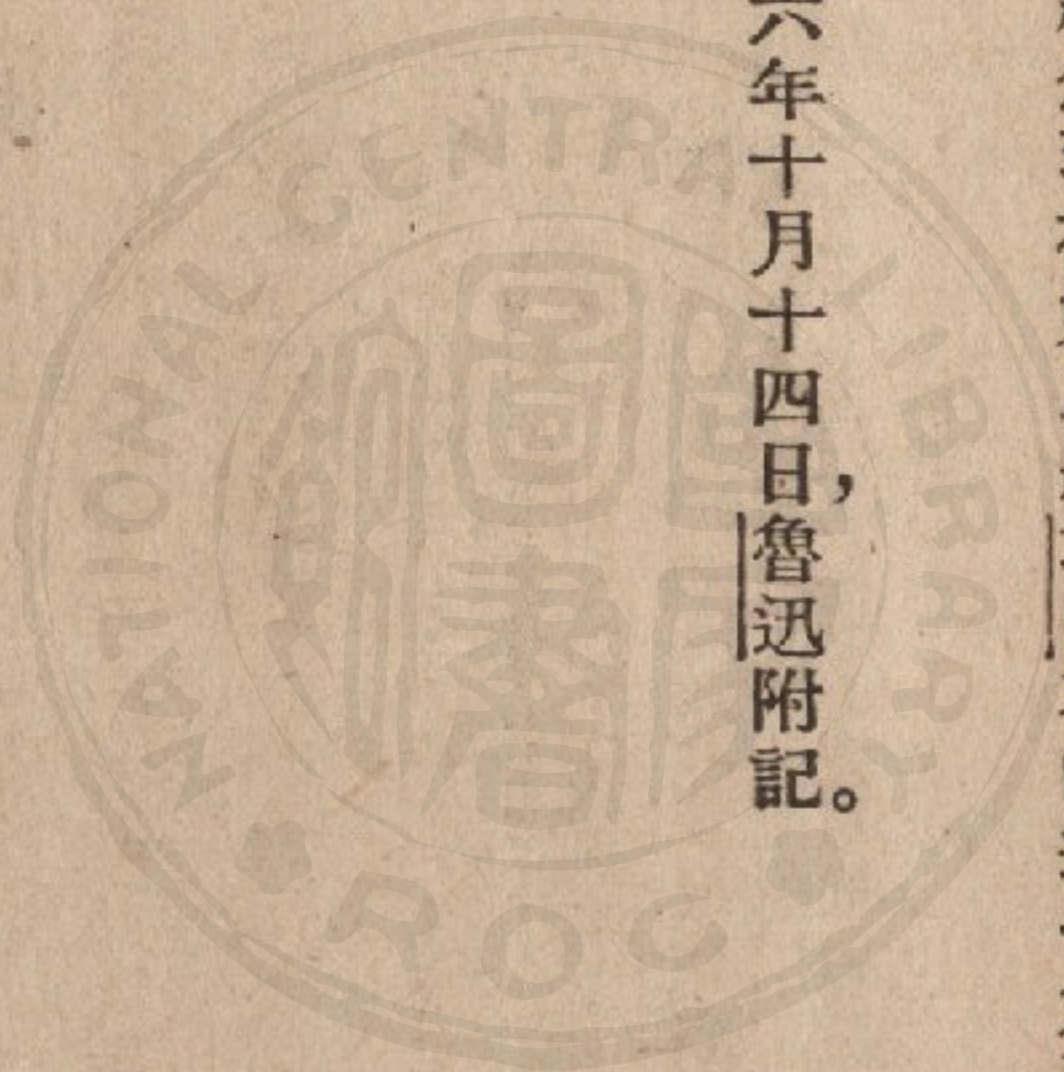
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于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着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自費了。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于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我赴這會的後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見日報，知道女師大已改為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可澄自做院長，師範部的學長是林素園。後來看見

北京九月五日的晚報，有一條道：『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共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原來剛一週年，又看見用兵了。不知明年這日，還是帶兵的開得校紀念呢，還有被兵的開毀校紀念？現在姑且將培良君的這一篇轉錄在這裡，先作一個本年的紀念罷。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附記。



上海通信

小峯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麼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卻有一個穿制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麼？』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裏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囂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卻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

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里來演說，『使之聞之。』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爲錢爲什麼？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爲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鎗，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唸唸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麼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週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裏，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只好趁夜車，便在客寓裏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只是『我以爲』，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爲牠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

裏一般。

正在田野裏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着鎗，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羣。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纔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羣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鎗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鎗階級』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鐘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裏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裏，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纔遇見滿口英語的學生，纔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

單上，纔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噓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閒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裏了；急于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的，樂于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爲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纔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里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

八月三十日，上海。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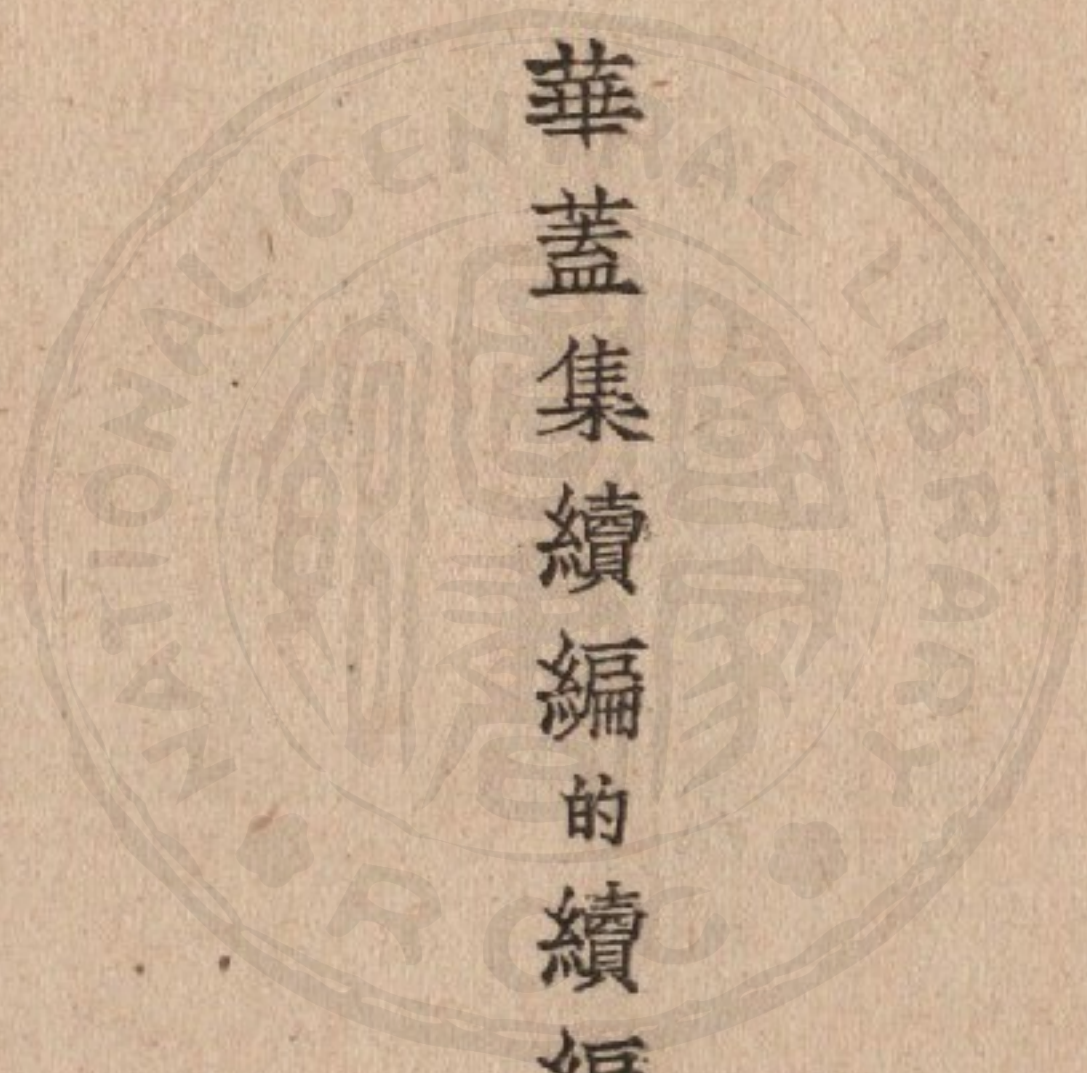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華蓋集續編的續編





在廈門島的四個月，只做了幾篇無聊文字，除去最無聊者，還剩六篇，稱為華蓋集續編的續編，總算一年中所作的雜感全有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魯迅記。



廈門通信

H. M. 兄：

我到此快要一個月了，懶在一所三層樓上，對於各處都不大寫信。這樓就在海邊，日夜被海風呼呼地吹着。海濱很有些貝殼，檢了幾回，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四圍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鋪，只有一家，買點罐頭食物和糕餅，掌櫃的是一個女人，看年紀大概可以比我長一輩。

風景一看倒不壞，有山有水。我初到時，一個同事便告訴我：山光海氣，是春秋早暮都不同。還指給我石頭看：這塊像老虎，那塊像癩蝦蟆，那一塊又像什麼什麼……我忘記了，其實也不大相像。我對於自然美，自恨並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但

好幾天，卻忘不掉鄭成功的遺跡。離我的住所不遠就有一道城牆，據說便是他築的。一想到除了臺灣，這廈門乃是滿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委實覺得可悲可喜。臺灣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謂『聖祖仁皇帝』二十二年纔亡的，這一年，那『仁皇帝』們便修補十三經和二十一史的刻板。現在呢，有些國民巴不得讀經；殿板二十一史也變成了寶貝，古董藏書家不惜重資，購藏于家，以貽子孫云。然而鄭成功的城卻很寂寞，聽說城腳的沙，還被人盜運去賣給對面鼓浪嶼的誰，快要危及城基了。有一天我清早望見許多小船，喫水很重，都張着帆駛向鼓浪嶼去，大約便是那賣沙的同胞。

周圍很靜；近處買不到一種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時也覺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見灰煙瘴氣的現代評論。這不知是怎的，有那麼許多正人君子，文人學者執筆，竟還不大風行。

這幾天我想編我今年的雜感了。自從我寫了這些東西，尤其是關於陳源的東西以後，就很有幾個自稱『中立』的君子給我忠告，說你再寫下去，就要無聊了。我卻並非因為忠告，只因環境的變遷，近來竟沒有什麼雜感，連結集舊作的事也忘卻了。前幾天的夜

裏，忽然聽到梅蘭芳『藝員』的歌聲，自然是留在留聲機裏的，像粗糙而鈍的針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雜感，大約也刺得佩服梅『藝員』的正人君子們不大舒服罷，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雜感是印在紙上的，不會振動空氣，不願見，不翻他開來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來哄騙我。我願意我的東西躺在小攤上，被願看的買去，卻不願意受正人君子賞識。世上愛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歡曼陀羅花或無名小草的，朋其還將霸王鞭種在茶壺裏當盆景哩。不過看看舊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給我抄一點麼？

此時又在發風，幾乎日日這樣，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時也偶然去散步，在叢葬中，這是 Borel 講廈門的書上早就說過的：中國全國就是一個大墓場。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寫先妣某而沒有兒子的姓名的；有頭上橫寫着地名的；還有刻着『敬惜字紙』四字的，不知道叫誰敬惜字紙。這些不通，就因為讀了書之故。假如問一箇不識字的人，墳裏的人是誰，他道父親；再問他什麼名字，他說張二；再問他自己叫什麼，他說張三。照直寫下來，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寫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塗，他不知道研究

『金石例』的，從元朝到清朝就終於沒有了局。

我還同先前一樣；不過太靜了，倒是什麼也不想寫。

魯迅。

九月二十三日。



廈門通信(二)

小峯兄：

{語絲}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許多信件一同收到，在這里是常有的事，大約每星期有兩回。我看了這兩期的{語絲}特別喜歡，恐怕是因為他們已經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罷。在中國，幾個人組織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實在是不容易的。

我雖然在這里，也常想投稿給{語絲}，但是一句也寫不出，連『野草』也沒有一莖半葉。現在只是編講義。爲什麼呢？這是你一定了然的：爲喫飯。喫了飯爲什麼呢？倘照這樣下去，就是爲了編講義。喫飯是不高尙的事，我倒並不這樣想。然而編了講義來喫飯，喫了飯來編講義，可也覺得未免近于無聊。別的學者們教授們又作別論，從我們平常人看來，教

書和寫東西是勢不兩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書，或者發狂變死地寫東西，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

忽然記起一件事來了，還是夏天罷，現代評論上彷彿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說過：因為罵人的小報流行，正經的文章沒有人看，也不能印了。我很佩服這些學者們的大才。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調查一下，他們有多少正經文章的稿子『藏于家』給我開一個目錄？但如果是講義，或者什麼民法八萬七千六百五十四條之類，那就不必開，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園兄的信，說北京已經結冰了。這裡卻還只穿一件夾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先生的什麼『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癯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等類妙文，拿到這裡來就完全是『無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卻並不離披，景象大概還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門前有一株不認識的植物，開着秋葵似的黃花。我到時就開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開起的；現在還開着；還有未開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麼時候纔肯開完。『古已有之』，『于今爲烈』，我近來很有些怕敢看他了。還有雞冠花，很細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紅紅黃黃地永是這樣

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來不大喜歡下地獄，因為不但是滿眼只有刀山劍樹，看得太單調，苦痛也怕很難當。現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時皆春，一年到頭請你看桃花，你想够多麼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車輪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時候，暫時喫驚，決不會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然而荷葉卻早枯了；小草也有點萎黃。這些現象，我先前總以為是所謂『嚴霜』之故，于是有時候對於那『稔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擊。然而這里卻沒有霜，也沒有雪，凡萎黃的都是『壽終正寢』，怪不得別個。嗚呼，牢騷材料既被減少，則又有何話之可說哉！

現在是連無從發牢騷的牢騷，也都發完了。再談罷。從此要動手編講義。

魯迅。十一月七日。

阿Q正傳的成因

在文學週報二五一期裏，西諦先生談起吶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藉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爲然，至今也還不以爲然，似乎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

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于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爲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爲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喫，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爲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

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騎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于『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吶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為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 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為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為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為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為于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為『開心話』的

了，每週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卻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閒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爲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爲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

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於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裏，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里能够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裏想着，『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週考，真是爲難……』然而終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樣地一週一週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

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篾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爲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麼？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Q卻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鎗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于催稿，如何笑嘻嘻，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幹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麼，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于初寫時可會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

個疑問。我彷彿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於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卻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 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卻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里鎗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鎗，一共打了七鎗。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羣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鎗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

無須給死者這麼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鎗，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
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並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拴子刀鋤而死，其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鋤餘人槍斃 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為從了毅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會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鋤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冲北，對着已備好的刑棹前站着……杜並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後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鋤，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槍決的宋振

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後由某排長拿手槍站在宋等的後面，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槍斃命……先時，被害程步墀的兩個兒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麼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着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敘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着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真是怎麼好……。

至于阿Q正傳的譯本，我只看見過兩種。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歐羅巴上，還止三分之一，是有刪節的。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譌成他

們能懂的『柿油黨』了。



(十二月三日，在廈門寫。)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

闊別了多年的S F君，忽然從日本東京寄給我一封信，轉來轉去，待我收到時，去發信的日子已經有二十天了。但這在我，卻真如空谷裏聽到跫然的足音。信函中還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東京國民新聞的記載，是德富蘇峯氏糾正我那小說史略的謬誤的。

凡一本書的作者，對於外來的糾正，以爲然的就遵從，以爲非的就緘默，本不必有一說明下筆時是什麼意思，怎樣取捨的必要。但蘇峯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經記的收藏者，那措辭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來說幾句話。

首先還得翻出他的原文來——

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

蘇峯主

頃讀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舊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內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爲宋時臨安書舖，世因以爲宋刊，然逮于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爲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這倒並非沒有聊加辯正的必要。

○ ○ ○
大唐三藏取經記者，實是我的成篋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經詩話的袖珍本，則是故三浦觀樹將軍的珍藏。這兩書，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紅葉廣知于世，從京都掛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書中的高山寺的印記，又看高山寺藏書目錄，都證明着如此。

這不但作爲宋槧的稀本；作爲宋代所著的說話本（日本之所謂言文一致體，）也最可珍重的罷。然而魯迅氏卻輕輕地斷定道，『此書或爲元人撰，未可知矣。』過于太早計了。

魯迅氏未見這兩書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見，則其爲宋槧，決不容疑。其紙質，其墨色，其字體，無不皆然。不僅因爲張家是宋時的臨安的書舖。

加之，至于成簣堂的取經記，則有着可以說是宋版的特色的闕字。好個羅振玉氏，于此早已覺到了。

皆（三浦本，成簣堂本）爲高山寺舊藏。而此本（成簣堂藏取經記）

刊刻尤精，書中驚字作驚，敬字缺末筆，蓋亦宋槧也。（雪堂校刊羣書敍錄）

想魯迅氏未讀羅氏此文，所以疑是或爲元人之作的罷。即使世間多不可思

議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 ○ ○
羅振玉氏對於此書，曾這樣說。宋代平話，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宋人平話之傳于人間者，至是遂得四種。因為是斯學界中如此重要的書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無用之業罷。

總之，蘇峯氏的意思，無非在證明三藏取經記等是宋槧。其論據有三——

一 紙墨字體是宋；

二 宋諱缺筆；

三 羅振玉氏說是宋刻。

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為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錯誤，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師取經記及詩話兩種，所見的卻是羅氏影印本，紙墨雖新，而字體和

缺筆是看得出的。那後面就有羅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羣書敍錄，我所謂『世因以爲宋刊』即指羅跋而言。現在蘇峯氏所舉的三證中，除紙墨因確未目覩，無從然否外，其餘二事，則那時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來了。

某朝諱缺筆是某朝刻本，是藏書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祕訣，只要稍看過幾部舊書的人，大抵知道的。何況缺筆的驚字的怎樣地觸目。但我卻以爲這並不足以確定爲宋本。前朝的缺筆字，因爲故意或習慣，也可以沿至後一朝。例如我們民國已至十五年了，而遺老們所刻的書，儀字還『敬缺末筆』，非遺老們所刻的書，寧字玄字也常常缺筆，或者以甯代寧，以元代玄。這都是在民國而諱清諱；不足爲清朝刻本的證據。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易林注殘本（現有影印本，在四部叢刊中），恆字構字都缺筆的，紙質，墨色，字體，都似宋；而且是蝶裝，繆荃孫氏便定爲宋本。但細看內容，卻引用着陰時夫的韻府羣玉，而陰時夫則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爲不能據缺筆字便確定爲某朝刻，尤其是當時視爲無足重輕的小說和劇曲之類。

羅氏的論斷，在日本或者很被引爲典據罷，但我卻並不盡信奉，不但書跋，連書畫金

石的題跋，無不皆然。即如羅氏所舉宋代平話四種中，宣和遺事我也定爲元人作，但這並非我的輕輕斷定，是根據了明人胡應麟氏所說的。而且那書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話都有，也不盡是『平話』。

我的看書，和藏書家稍不同，是不盡相信缺筆，擡頭，以及羅氏題跋的，因此那時便疑只是疑，所以說『或』說『未可知』。我並非想要唐突宋槧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過輕輕疑而已，至于『輕輕地斷定』則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確的證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證明之後，就成爲這樣的事：魯迅疑是元刻，爲元人作；今確是宋槧，故爲宋人作。無論如何，蘇峯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這滑稽劇，是未必能夠開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雜入一點滑稽輕薄的論調，每容易迷眩一般讀者，使之失去冷靜，墜入彀中，所以我便譯出，并略加說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

新女性八月號登有『狂飈社廣告』說：『狂飈運動的開始遠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少數最進步的青年文學家合辦莽原……茲爲大規模地進行我們的工作起見於北京出版之烏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種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籌辦狂飈叢書及一篇幅較大之刊物』云云。我在北京編輯莽原、烏合叢書、未名叢刊三種出版物，所用稿件，皆係以個人名義送來；對於狂飈運動，向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如何運動，運動甚麼。今忽混稱『合辦』，實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聲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則假借虛名，加我紙冠，已非一次，業經先有陳源在現代評論上，近有長虹在狂飈上，疊加嘲罵，而狂飈社一面又錫以第三頂『紙糊的假冠』，真是頭少帽多，欺人害己，雖

『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來特此聲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驅者』即英文 Forerunner 之譯名。此等名號，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別有作用，本人事前並不知情，事後亦未嘗高興。倘見者因此受愚，概與本人無涉。



廈門通信(三)

小峯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兩篇，想已到。其實這一類東西，本來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則因爲這里有幾個少年希望我要幾下，二則正苦于沒有文章做，所以便寫了幾張，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點批評廈門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沒有做，言語不通，又不知各種底細，從何說起。例如這裏的報紙上，先前連日鬧着『黃仲訓霸佔公地』的筆墨官司，我至今終于不知道黃仲訓何人，曲折怎樣，如果竟來批評，豈不要笑斷真的批評家的肚腸。但別人批評，我是不妨害的。以爲我不准別人批評者，誣也；我豈有這麼大的權力。不過倘要我做編輯，那麼，我以爲不行的東西便不登，我委實不大願意做一個莫名其妙的什麼

運動的傀儡。

前幾天，卓治睜大着眼睛對我說，別人胡罵你，你要回罵。還有許多人要看你的東西，你不該默不作聲，使他們迷惑。你現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聽了又打了一個寒噤，和先前聽得有人說青年應該學我的多讀古文時候相同。嗚呼，一戴紙冠，遂成公物，負『幫忙』之義務，有回罵之必須，然則固不如從速坍塌，還我自由之爲得計也。質之高明，未識以爲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廈門大學的職務，我已經都稱病辭去了。百無可爲，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幾個學生向我訴苦，說他們是看了廈門大學革新的消息而來的，現在不到半年，今天這個走，明天那個走，叫他們怎麼辦？這實在使我夾脊梁發冷，啞口無言。不料『思想界權威者』或『思想界先驅者』這一頂『紙糊的假冠』竟又是如此誤人子弟。幾回廣告（卻並不是我登的）將他們從別的學校裏騙來，而結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真是萬分抱歉。我很惋惜沒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記事，將學生們攔住。『見面時一談，不見時一戰』哲學，似乎有時也很是誤人子弟的。

你大約還不知道底細，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確想在這裡住兩年，除教書之外，還希望將先前所集成的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鉤沈印出。這兩種書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請你印。因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無疑，惟有有錢的學校纔合適。及至到了這裡，看看情形，便將印漢畫象考的希望取消，並且自己縮短年限為一年。其實是已經可以走了，但看着語堂的勤勉和為故鄉做事的熱心，我不好說出口。後來豫算不算數了，語堂力爭；聽說校長就說，只要你們有稿子拿來，立刻可以印。于是我將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約至多十分鐘罷，拿回來了，從此沒有後文。這結果，不過證明了我確有稿子，並不欺騙。那時我便將印古小說鉤沈的意思也取消，並且自己再縮短年限為半年。語堂是除辦事教書之外，還要防暗算，我看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弄得力盡神疲，真是冤枉之至。

前天開會議，連國學院的週刊也幾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長的意思，卻要添顧問，如理科主任之流，都是顧問，據說是所以連絡感情的。我真不懂廈門的風俗，為什麼研究國學，就會傷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而必用顧問的繩，將他絡住？聯絡感情法我沒有研究過；兼士又已辭職，所以我決計也走了。現在去放假不過三星期，本來暫停也無妨，然而這裡對

于教職員的薪水，有時是錙銖必較的，離開學校十來天也想扣，所以我不想來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至今天止，扣足一月。昨天已經出題考試，作一結束了。閱卷當在下月，但是不取分文。看完就走，刊物請暫勿寄來，待我有了駐足之所，當即函告，那時再寄罷。

臨末，照例要說到天氣。所謂例者，我之例也；怕有批評家指爲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例，所以特此聲明：並非如此。天氣確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黃得多，然而我那門前的秋葵似的黃花卻還在開着，山裏也還有石榴花。蒼蠅不見了，蚊子間或有之。

夜深了，再談罷。

魯迅

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再睡了一覺醒來，聽到柝聲，已經是五更了。這是學校的新政，上月添設，更夫也不止一人。我聽着，纔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聲調最分明地可以區別的有兩種——

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

打更的聲調也有派別，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當作一件新聞。

海上通信

小峯兄：

前幾天得到來信，因為忙于結束我所擔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現在總算離開廈門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海上。總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卻看見島嶼，但毫無風濤，就如坐在長江的船上一樣。小小的顛簸自然是有的，不過這在海上就
算不得顛簸；陸上的風濤要比這險惡得多。

同艙的一個是臺灣人，他能說廈門話，我不懂；我說的藍青官話，他不懂。他也能說幾句日本話，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于是乎只好筆談，才知道他是絲綢商。我于絲綢一無所知，他于絲綢之外似乎也毫無意見。于是乎他只得睡覺，我就獨霸了電燈寫信了。

從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閒空，給唐宋傳奇集做一篇後記，準備付印。不料現在又只得擱起來。至于野草，此後做不做很難說，大約是不見得再做了，省得人來謬託知己，繇皮論骨，什麼是『入于心』的。但要付印，也還須細看一遍，改正錯字，頗費一點工夫。因此一時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後來是等船。在最後的一星期中，住着實在很為難，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為要飯碗不容易，現在才知道不要飯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辭職時，是說自己生病，因為我覺得無論怎樣的暴主，還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並非氣厥病，也不至于牽連了別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給我開了幾次送別會，演說，照相，大抵是逾量的優禮，我知道有些不妥了，連連說明：我是戴着『紙糊的假冠』的，請他們不要惜別，請他們不要憶念。但是，不知怎地終於發生了改良學校運動，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長罷免大學秘書劉樹杞博士。

聽說三年前，這裏也有一回相類的風潮，結果是學生完全失敗，在上海分立了一個大夏大學。那時校長如何自衛，我不得而知；這回是說我的辭職，和劉博士無干，乃是胡適

之派和魯迅派相排擠，所以走掉的。這話就登在鼓浪嶼的日報民鐘上，並且已經加以駁斥。但有幾位同事還大大地緊張起來，開會提出質問；而校長卻答覆得很乾脆：沒有說這話。有的還不放心，更給我放散別種的謠言，要減輕『排擠說』的勢力。真是『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如果我安心在廈門大學喫飯，或者沒有這些事的罷，然而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長林文慶博士是英國籍的中國人，開口閉口，不離孔子，曾經做過一本講孔教的書，可惜名目我忘記了。聽說還有一本英文的自傳，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現在正做着人種問題。他待我實在是很隆重，請我喫過幾回飯；單是餞行，就有兩回。不過現在『排擠說』倒衰退了；前天所聽到的是他在宣傳，我到廈門，原是來搗亂，並非豫備在廈門教書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沒有辭掉。

現在我沒有到北京，『位置說』大概又要衰退了罷，新說如何，可惜我已在船上，不得而知。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見其深重的，因為中國向來就是『當面輸心背面笑』，正不必『新的時代』的青年纔這樣。對面是『吾師』和『先生』，背後是毒藥和暗箭，

領教了已經不只兩三次了。

新近還聽到我的一件罪案，是關於集美學校的。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現在因為反對校長，鬧了風潮了。先前，那校長葉淵定要請國學院裏的人們去演說，于是分爲六組，每星期一組，凡兩人。第一次是我和語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書來迎接。此公和我談起，校長的意思是以為學生應該專門埋頭讀書的。我就說，那麼我卻以為也應該留心世事，和校長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罷。他卻道不妨，也可以說說。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長實在沈驚得很，殷勤勸我喫飯。我卻一面喫，一面愁。心裏想，先給我演說就好了，聽得討厭，就可以不請我喫飯；現在飯已下肚，倘使說話有背謬之處，適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後講演，我說的是照例的聰明人不能做事，因為他想來想去，終于什麼也做不成等類的話。那時校長坐在我背後，我看不見。直到前幾天，纔聽說這位葉淵校長也說集美學校的鬧風潮，都是我不好，對青年人說話，那里可以說人是不必想來想去的呢。當我說到這裏的時候，他還在後面搖搖頭。

我的處世，自以為退讓得儘够了，人家在辦報，我決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開會，我決

不自己去演說。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須任憑我說一點我所要說的話，否則，我寧可一聲不響，算是死屍。但這裡卻必須我開口說話，而話又須合于校長之意。我不是別人，那知道別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的妙法，又未曾學過。其被搖頭，實活該也。

但從去年以來，我居然大大地變壞，或者是進步了。雖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經沒有創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並不覺著一點沈重了。這是我經歷了許多舊的和新的世故之後，纔捱得的。我已經管不得許多，只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進而和他們衝突，蔑視他們，並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場。海上的月色是這樣皎潔；波面映出一大片銀鱗，閃爍搖動；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彷彿很溫柔。我不信這樣的東西是會淹死人的。但是，請你放心，這是笑話，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還毫沒有跳海的意思。

魯迅。

一月十六夜，海上。

魯迅先生紀念集

華蓋集續編

12.



著者魯

迅

編纂者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每部分訂三十三冊

國家圖書館



000605427



籍